

十大思想家(三)

董原 主编



目 录

爱国孤臣康有为	1
心学大师王守仁	51
启蒙大师魏源	93

爱国孤臣康有为

一、南海西樵一狂人

1858年3月19日，康有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

南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城，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它背靠广东省会广州，濒临珠江出海口，交通方便，信息灵通，较早地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意识的影响。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不仅诞生了康有为，还孕育了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和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何香凝等一批著名人物。

在康有为诞生之前，帝国主义者已经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在离南海县不远的珠江口爆发。此后，帝国主义侵略的硝烟，在珠江三角洲连绵不绝。与此同时，在这个首先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缺口”的地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悄然崛起。1872年在南海县简村，陈启源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开始用蒸汽机缫丝。此后20余年间，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涌现出一大批以机器生产为主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祖上当过官，还是个书香门第。康有为的祖父和父亲，主要担任教育方面的官职。康有为的叔祖康同器，因为参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功，被清政府封为护理广西巡抚的大官。他晚年回到南海县家乡，大兴土木，修筑祖宗祠堂和园林宅第。其中有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环境优美，藏书丰

富，是南海县有名的园林和藏书楼，也是康有为少年时代吸取知识、受到启蒙的地方。

康有为青少年时代就在这样一个富有而优雅的环境中成长。他出生在园林里的延香老屋，读书在藏书丰富的澹如楼。

尔后，由于康有为长期从事维新教育事业，参加“百日维新”运动，在家乡颇有名望，人们按照习俗，也把他和他的故乡联系起来，称他为南海先生或康南海。

维新运动失败后，清政府查抄了康有为的家产，还掘了他的祖坟。延香老屋和澹如楼早已荡然无存。1983年，广东省南海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延香老屋旧址重建康有为故居。近年来，南海县人民政府又在故居旁边兴建一座占地10余万平方米的康有为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对历史做出过贡献的“先进的中国人”。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有为的祖先一般都走两条路；一条是从军习武，打仗做官；另一条是读书求功名，科学致仕。后来也有少数家族成员受到资本主义思潮影响，从事实业和经商。但不管是当上武官或文官，甚至成了商人，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读书治学。例如被康有为称为康氏家族创业祖先的康涵沧，虽然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但是他能文善诗，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治学。因此，在康氏家族的祖先中，有许多人考取了举人和进士。

祖父康赞修科举致仕，在清道光年间考取举人后，先后在各地担任“教谕”、“学正”、“教授”、“训导”等。父亲康达初是当时岭南著名的儒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青年时代曾经投笔从戎，在军队里从事案头文书工作。不幸活到38岁即因病逝世。他在临终时还叮嘱子女要“

立志勉学”。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并自认为“教育世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康有为的学问、志趣和品格，就是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教育世家”中熏陶和成长起来的。他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够背诵上百首唐诗，先后受教于简凤仪先生等。他们按照封建的正统教育规范，让康有为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教他学做八股文章。但是康有为从小就讨厌八股制艺，而喜欢博览群书，随心所欲地做文章，所以他从14岁开始参加封建科举的初级考试童子试，常常名落孙山。

对少年康有为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康赞修是清朝举人，当过掌管轨育的地方官，为人正直，在人际交往中重视情谊和品德，诲人不倦，是封建时代的一位优秀教育工作者。

康有为从8岁开始，就经常在祖父身边读书，得到过精心指点，受到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父亲康达初去世后，11岁的康有为就随同祖父到任职的连州和广州等地。康赞修一直把他所宠爱的孙子康有为带在身边，读书诵经，谈古论今，寻师访友。游山玩水。祖孙二人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少年康有为才思敏捷，聪明好学，孜孜不倦地攻读经典，博览群书。每天天刚亮，他就端坐在书桌旁，书声琅琅，全神贯注；太阳下山了，天色昏暗，他又捧着书到廊沿下，借助落日的余晖，仍然手不释卷地阅读；晚上点起一盏小油灯，常常读到夜深人静，直到祖父命令他上床睡觉才止。

连州一带有许多历史遗址。祖父经常带着他去参观，

一边观看遗址古迹，一边谈古论今；遇到先哲、大儒和名士的碑帖诗文，就随时介绍，并且借题发挥，给康有为指点和启发。在辅导康有为读书耐也是这样。有一次，读到《明史》中的《袁督师传》，其中描写这位明末的大将长期驻守边防，曾经向崇祯皇帝提出抵御侵略的重要建议，可惜未被采纳，还受到排挤。祖父对康有为说：这是因为明朝当权的人畏惧他的将才，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排挤他。康有为对这位大将的雄才大略深力敬佩，不禁感叹地说：“假如他不被当权者所妒，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略，明朝也许不会有亡国之痛。”祖父这种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教育方法，加上康赞修本人的品德行为，对少年康有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祖父在连州掌管教育时，康有为常常从祖父的书桌上看到清政府发下来的《邸报》，上面记载了许多国家和朝廷的政治大事。从《邸报》上他第一次知道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物，了解到很多朝廷里的事情。这使少年康有为眼界大开，在他心灵上打开了一扉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窗户，培育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康有为还从祖父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读到了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编著和翻译的书籍；他们是近代最早把西方文化和科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外学者，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这些译著是向康有为打开了一扉通往西方文明的窗口，对他后来向西方学习、推行变法维新起了重要作用。

祖父调到广州任职时，康有为也随同前往；当时已经被帝国主义者的大炮轰开了门户的广州，是一个百业

兴旺，商贾云集，中外交往频繁，带有初期资本主义风貌的都市。这使康有为感到新鲜和惊奇；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康有为对祖父的感情特别深厚。1877年康赞修不幸逝世，对康有为是一次感情上的沉重打击。

由于康有为从小厌倦做八股文，所以一直到他18岁成年时，在科举考试方面还是屡试屡败，始终没有取得封建时代文人应有的功名。他在失望中充满了愤懑情绪，下决心要寻求名师，发奋苦读。

1876年，他曾离开已经年届古稀的祖父，到了离家不远的九江镇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朱次琦是康有为祖父的好朋友，也是他父亲康达初的启蒙老师，在礼山草堂办学多年，远近闻名。

朱次琦早年当过清政府的地方官吏，1858年后就回到礼山草堂，从事教书育人工作达20余年，是这一带很有名气的学者，被当地人尊称为“九江先生”。在学术观点上，朱次琦虽然以理学为主，但从不排斥其它学派；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是“济人经世”；他赞赏清初的汉族爱国学者顾炎武和王夫之的儒家学说，反对当时腐败的社会和浮华的学风。朱次琦的文章道德与康有为的思想很对路，所以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经把朱次琦对他的教导，比作是长途跋涉的旅客找到了安顿住宿的客店，使“盲人”又重见光朋，使他能够立志在30岁之前读遍中国著名的经典，以圣贤为榜样；以天下为己任。

在教育方法上，朱次琦强调要博览群书，要把读书和做人联系起来，而且他首先身体力行。这些对康有为的思想、治学、做人，乃至整个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礼山草堂里。康有为勤奋苦读。三年时间里，他从先秦到唐代，从文学到史学，对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进行了系统研究，有许多篇章都能背诵。他在学习过程中喜欢广征博引，发表议论，多次受到朱次琦的好评。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又善于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如对于韩愈的评价，师生之间就有明显分歧。

礼山草堂的三年苦读，使康有为奠定了比较深厚的旧学基础，朱次琦“经世致用”的学用一致思想，更对康有为一生都产生很大影响。但是这三年的苦读，并没有使康有为找到解决国弱民困的答案。他很苦闷。1878年冬天，康有为终于离开了礼山草堂，又投身到茫茫的人海中，继续寻求自己的理想和出路。

康有为离开礼山草堂以后，又陷入无边的苦闷。他已经21岁了，还没有取得功名，也没有找到个人的出路，终日忧郁，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来思考自己的前途。1879年初春，康有为到了家乡附近的西樵山。

在广东，西樵山以风景优美闻名，相传山上有9个洞穴，36块岩石，72座峰峦，28条瀑布，207处泉眼，漫山苍松，四季花香，是一处风光奇特的胜地。山上有一个石洞，相传明朝学者何白云曾经在这里读书，因为洞口常有白云缭绕，所以取名白云洞。白云洞经过何白云父子两代的经营，已经成为这一带著名的书院。

西樵山中风景如画，白云洞里安逸宁静，但是康有为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为了解脱思想上的苦闷，他学静坐，吃素食，读佛经，甚至练习五胜道仙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松自己的身心，想从宗教的唯心主义中寻求精神的解放。

有一天，住在广州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和几个文人

学士到西樵山来游览，他们在西樵山上遇见吕个青年人，只见上躺在青山绿水之间，忽而高声唱歌，忽而纵声狂笑，转眼又嚎啕大哭，衣衫不整，披头散发。这个青年人就是康有为。张鼎华想走上前去和他对话，但是未谈上几句就争论起来。不过，张鼎华也看出来这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康有为这种奇特、急躁、近乎疯狂的情绪表现，给张鼎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回到广州后逢人便说，他在西樵山上遇见了一个“异人”。不久，康有为在西樵山上的狂态就在广州城里传开了。

康有为后来才知道，他在西樵山上遇见的竟是名闻京华的张鼎华，于是就写了一封充满情意的书信给张鼎华，从此俩人之间建立起忘年之交。康有为经常往返于南海县和广州之间，他一到广州就找张鼎华促膝长谈。张鼎华身为朝廷大官，熟悉清政府的朝政，使康有为了解到许多朝廷里的历史掌故和现实情况，特别是听到当时知识界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潮。在张鼎华的指点下，康有为眼界大开。

张鼎华是康有为在苦闷求索中，给他指点出路的启蒙老师，使他朦胧地看到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出路所在。康有为后来承认，他的思想变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二、救国真理西方寻

康有为已经从书本上了解到不少关于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风貌、民情风俗等，也阅读了一批有关西方新兴文化和科技的书籍。但是，他更迫切地期望要考察一下西方世界的实况。以当时家庭的经济实力，不可能远游欧美诸国。于是，1879年底，他下决心到广州附近的香港进行实地考察。

香港自从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义者侵占，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与发展，已经是一个比较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兴旺的市场，整洁的街道，高耸的大厦，车水马龙却又管理有序，甚至包括空中那如同蜘蛛网一样的电线，都使康有为感到新鲜和惊异。同时，也对这片被帝国主义者侵占，落入洋人之手的中国土地，深感悲愤和依恋。

在香港短暂停留的日子里，他抓紧一切时间进行观察和体验。他跑到剧场里观看欧美的古典戏剧，进入大帐篷里观赏马戏团的表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中游览，实地考察了欧美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文化形态和生活习俗，这使他头脑里固有的、对传统封建文化的盲目自信，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偏见，开始发生变化。

在香港游览期间，他还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同乡人陈焕鸣。陈焕鸣曾经多年担任清政府驻日本国大使馆的英文翻译，精通英文，也懂日文，后来隐居香港。他家里藏有大量日文书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新书。经过陈焕鸣的介绍，康有为如获至宝，马上委托陈焕鸣从日本代为选购。从此，他通过陈焕鸣建立了一条从书本上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渠道。在香港逗留时，他还在书店里选购了一批包括世界各国地图在内的、有关西方发界的翻译书籍。此时，他向西方学习已经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

三年后，康有为在去北京赶考的路途中、又在上海作了短暂的停留，想再次实地考察一下上海的外国租界。他得到了和游览香港相似的印象。一方面从上海外国租界的繁荣兴旺景象中，进一步了解到西方人对社会的治理确有一套可以借鉴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国中国

"租界的存在，深感国家主权丧失的耻辱。强烈的时代感、民族的责任感，推动着年轻的康有为去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在上海时，他也把目光投向书籍，凡是有关西方的翻译书籍，他几乎是不加选择地购买，其中主要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所翻译的西方书籍。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改良主义维新思想从此又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近代维新改良主义思潮时，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康有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康有为少年时代已经从家庭的藏书中，第一次接触到《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一类世界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介绍近代西方文化科技的著译。

成年后，经历了礼山草堂的三年苦读，西樵山白云洞里的不倦探索，逐渐对传统的治国经典、伦理道德等产生了怀疑和失望。在这期间，他又读了《西国近事汇编》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介绍西方世界的历史资料和游记。特别是李圭 1876 年去美国游览的记述，以一个来自闭关自守国家的游览者的眼光，观察先进的西方世界的繁荣景象，传递了新的印象和信息。康有为不仅注意书中所描绘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风貌和经济状况，还特别重视李圭在书中提出的一个看法。当时有一批百余人的中国留美小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清政府里有些三张闭关自守的官员认为，派小学生到西方留洋学习，脱离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是舍本逐末。李圭根据他在美国和留学生中间进行的实地调查，在书中进行驳斥说：中国要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图，要跻身于

世界之林，必须学习西方的经验，取长补短；在学习经验上不应当划分中国和外国界线。这更激起了康有为向西方学习的热情。

据张伯桢在《万木草堂始末记》里统计，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译印的有关西方书籍，在近30年时间里大约出售12000册，而康有为一个人“购以赠友及自读者，达三千余册，为该局售书总数1/4强”，康有为还从上海订阅了一份美国人林乐如主编的《万国公报》，以了解最新的世界各国动态和信息。

在阅读的基础上，康有为在1886年还写了一部天文学的书《诸天讲》，对天文学的现象做了科学的解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一步改变了他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成为他后来的维新改良思想的科学理论先导。

康有为从这些书刊中吸取思想营养，了解到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经济管理、历史地理和民情风俗，还攻读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的书籍，对天文学、物理学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后来在自编年谱里回顾这段生活经历时，认识到对西方新道理、新知识的渴求和思考，使他在思想观念上，不断地获得新的启发和进步。

康有为一方面努力向西方寻求新道理，一方面开始向封建正统的习俗展开攻势，不断地破旧立新。反对缠足，并且先从自己家里做起，进一步在社会上创建“不裹足会”，这是他破旧立新思想的一次实践。

缠足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恶习。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的要求，女孩子到了四五岁，就要由家里长辈为她裹足。每天用长长的宽布条把双足缠紧，控制骨肉生长，使双足尽量限制在大约3寸长度，因而造成双足畸形，行动受阻，甚至骨折。这种违背人类生理发育的做法，是清

代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之一，目的是要妇女成为男子的附庸。它使广大妇女饱受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康有为大声疾呼：中国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仁人志士，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缠足，为女子说几句公道话呢？他发誓：要把当时约占全国人口半数的两亿妇女从缠足的痛苦中拯救出来。

1883年，康有为的大女儿康同薇年满5岁，按照封建习俗就要每天给她缠足了。但是，康有为坚持不替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件事在故里乡人和宗族父老中间引起了强烈震动，有人公开站出来指手画脚，有人用讥讽的语言进行攻击，也有人怀着惊奇的目光注视这种“反叛”行动。有些同族长辈甚至准备强迫康同薇缠足。但康有为毫不动摇，而且也不给次女康同璧缠足。逐渐地，有不少妇女也提出来反对裹足，以解除自己的痛苦。

当时，在离康有为家不远的上金欧堡松圻村，住着一位开明绅士区谔良。他曾经在清政府里任官职，被派驻到美国、日本等国出使过，还是清政府驻美国哈佛大学幼童出洋总局的总办。他家里的女孩子也一律不裹足。这对于康有为来说，无疑是找到了一个“知音”。

为了进一步在全社会推动不裹足运动，康有为联合区谔良，酝酿成立一个“不裹足会”，他亲自起草了《不裹足会草例》。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凡是自愿参加这个会的人，首先应当保证不替自己家庭里的女孩子裹足；其次，对于已经裹足的妇女，不采取强迫命令要她们放足，但如果本人愿意放足，广大会员就要前去向她表示庆贺。

有了康有为反对裹足的榜样，又有“不裹足会”的宣

传鼓动，社会上参加不裹足会的人逐渐地多起来，暗中在自己家里开始不裹足的人就更多了。1895年康有为又到广州开展妇女不裹足运动，并成立了粤中“不裹足会”。

康有为创建的“不裹足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女性裹足的民间团体。在它的影响下，上海、北京、福州和湖南、江苏等广大城乡，纷纷开展了不裹足运动。1895年，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著名人物。进而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不裹足会”，总会设在上海，省设分会，州县设小分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缠足的运动。

中法战争从1883年至1885年总共延续了三年，影响遍及南方各省，在中国的广西、福建、台湾、浙江省，以及邻近的越南，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法国侵略者从侵占越南开始，企图占领和控制中国的南方几省。由于清政府在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面前，没有思想准备，缺乏对策，一忽儿与对方议和签约，一忽儿又与对方发生激战，因而造成战争的不断失利。驻守在福建马尾的清军水师，遭受法国舰队的突然袭击，在海战中，七艘舰只被击沉，官兵伤亡七百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虽然在三年的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曾经多次打败法军，冯子材在镇南关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法军企图侵占台湾淡水和浙江镇海都受到坚决抵抗，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却下令“乘胜即收”。结果法国侵略者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却在谈判桌上得逞，获得了在中国建筑铁路等大批特权。清政府竟变成了一个实际的战败国。

这场结局奇怪的战争，震惊了无数爱国的中国人的心灵，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思，其中也包括康有为。

中法战争初期，康有为本来住在广州，后来受战争

影响，被迫回乡避难。战争期间，广东省各地曾经出现自发的群众性反法示威，香港船坞的中国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不给法国轮船装卸货物，还举行了抗议港英当局镇压反法斗争的罢工罢市。旅居日本、美国和东南亚一带的爱国华侨，为支持国内的抗法战争发动了爱国捐款。中法战争激发起全民族的爱国热情，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真思考救国救民的途径，也促使改良维新思潮进一步发展起来。

中法战争对康有为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强横野蛮，清政府的腐败怯懦，举国上下的爱国热情，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敌，尤其是福建马江战役中国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剧，促使康有为进一步思考变法维新的道路。他后来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他从中法战争的经过和结局中看到，清政府的势力一天比一天衰弱，只有发愤图强，及时下决心进行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弊病，才有可能支撑住政权；倘若错过这个时机，等到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那时要想变法维新也来不及了。

三、兴办教育倡维新

康有为在 1889 年秋天又回到广东，定居广州。政治理想的挫折，促使他冷静地思考：为什么变法维新思想不能在社会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反而遭到这样大的波折？他认为，这与清代社会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有关，如果不在中国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就无法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因此，他下决心在广州兴办教育，教书育人，为变法维新培养人才。

1890年春天，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听人说起康有为在北京因为上书清帝，请求变法维新而遭受挫折，就慕名去拜见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康有为就热情坦率、滔滔不绝地向陈千秋讲述他对古籍的见解，以及变法维新的种种设想。这次谈话，对于陈千秋来说，好比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一块大石头，激起思想上的层层波涛。他被康有为渊博的学问、大胆的思考和爱国的热情深深感动了。于是，他成为康有为在广州办学的第一名学生。

接着，陈千秋又引荐了对康有为慕名已久的同窗好友梁启超，也拜康有为做老师。从这以后，广州地区闻名而来拜师受业、投身康有为门下的青年人先后有20余人。

于是，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办学堂。最初叫长兴学舍，后来经过几次迁移变化，也称为万木草堂。

广州是南方的重要商埠，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在康有为兴办长兴学舍之前，广州城里已经有广雅书院、粤秀书院等近十家书院。这些历史悠久的大书院，实力雄厚，但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所以显得暮气沉沉。

康有为公开声明，长兴学舍的办学方针是“经世致用”，就是要讲授对现实社会有意义的学问，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所以在长兴学舍里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康有为不仅教他们读书做学问，还教学生唱歌跳舞，带领学生上体育课。长兴学舍里新颖的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和气氛，在广州的知识界引起很大的轰动。一些封建的卫道七们，纷纷攻击康有为和他这个小小的长兴学舍；尤其使那些守旧分子不能容忍的是，康有为

居然在课堂上借着讲授中外历史和中国传统哲学时，大肆宣扬他的变法维新政治主张。

长兴学舍招收学生的标准也与众不同，不论封建的门第观念，也不管学生原有学问的深浅，对入学的年龄也不作死规定，主要是看学生是否具有开拓性的思想，能否接受变法维新主张。所以在康有为的学生里，年龄最大的崖州举人林纘统，比康有为还年长近 30 岁，入学时已经 50 余岁了；最小的学生叫梁朝杰，入学时只有十六、七岁。

长兴学舍的入学考试办法也十分特殊。康有为不实行通常的命题做文章的笔试，而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决定录取与否。后来有学生回忆说：在个别谈话时，他也不出题目，而是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看来是在进行漫无边际的交谈，实际上，通过这种漫谈方式，他既摸清了学生的思路，也了解了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知识面，特别是知道了学生对变法维新的看法。

康有为这种生动活泼的办学内容和方法，曾经吸引了不少思想先进的青年入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支持他变法维新运动的骨干，像梁启超等还是得力助手。但也有少数慕名前来拜师受业的人，被康有为这种特殊方法的入学考试，以及这位老师大胆阐发的变法维新观念所吓退，不敢入门为徒。

长兴学舍学生中，后来名气最大、社会地位最高的是梁启超。梁启超长期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运动，人们往往把师生二人并称为“康梁”。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算是康有为的粤籍“大同乡”。少年时代，梁启超在家乡以“神童”闻名。12 岁考取秀才，17 岁考取举人，18 岁时拜康有为为师。在封建等级